

一、台湾新文学运动

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

最敬爱的青年诸君！

我这几年在海外奔波，所以没有工夫和诸君一块做事，甚至和诸君说话的机会也绝无，这是多么遗憾的事！但是我自好久好久以前就想对诸君说几句很重要（照我的意思是很重要的）的话，但只是找不出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忍之又忍，到如今已忍无可忍了，因此抽了些时间来和诸君商量商量。自从世界动乱以来，往日的文明已宣告破产，而各种新道德、新思想、新制度等等方在萌芽之时，诸君也根据民族自决与其他的理由，做了种种运动，提出种种的要求，想把台湾的社会也使其经过一番的改造。当时诸君未尝不勇敢酣战，然而诸君的运动经了一挫再挫，有的人已是丢盔舍甲而逃；有的虽还站在那里呐喊助战，但是心中却已是吓得半点的气力也没有了。当日参加运动的人，演了这幕悲戏，后来再要参加的人，胆子也就寒了。所以运动的势力，日见衰微，到现在不但未曾收效，且受了许多许多的困苦。这是因为有一种最厉害的武器，诸君不肯拿上战场。这武器是什么？团结、毅力、牺牲三者而已。舍此而言运动改造，无异与虎谋皮！

其实我们所处的社会是老早就应该改造的，但换了汤而不曾换药，所以我们今日仍处在不合现代生活的社会，就如坐在火山或炸弹之上，不知道几时要被它爆碎。与其要坐而待毙，

不若死于改造运动的战场 倒还干净的很。况且今日要改造社会 实有充分的可能性！

所谓改造社会，不外乎求众人的自由和幸福，而这自由和幸福是要由众人自己挣得的，才是真正而确固的，决不会从天外飞来，或是由他人送来的。犹如面包是劳动者额上流了汗才能得来的。舍得这条大路不走，终日只在神前祈祷，或是在路上叫讨，哪一个肯大发慈悲给你吃一顿饱？马克思甚至说：“人类一切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事迹。”^①，所以处今日的社会，老实不能学那上古时代的愚民的“不知不识，顺帝之则”了。因为你若这样说，谁给你自由和幸福？

敬爱的青年诸君呀！那些不良老年们我是不敢承其抬举了。最少希望诸君能够觉悟青年之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出来奋斗，不断地勇进，才有达到目的的一日！

然而诸君呵！诸君除几位极少数的人，还在那里一息奄奄请愿议会设置 之外，其他莫说改造社会的运动连个影子也没有，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进路也都已经走错了。诸君以为议会设置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社会的一切也就无从改造了，就自暴自弃的不独不与那些勇敢的兄弟们相助，或另向一方面开始活动，尚且站开在远远地望着他们嘲笑，有的甚至眩于利诱，要来陷害他们。唉，青年诸君呀！难道诸君对于现社会能够满足吗？或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的气力已经消失，而疲于与环境的无益的争战，所以绝望而屈从了吗？或是要“乐天天命”学陶潜的遁世者流吗？或是同情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吗？不然诸君怎的不读些有用的书来实际应用于社会，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诗，来做诗韵合解的奴隶，或讲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台湾的诗文等从没见过真正有文学价值的，

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粪堆里滚来滚去，滚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滚得一身臭粪。)想出出风头，竟然自称诗翁、诗伯，闹个不休。这是什么现象呢？不瞒诸君说，诸君若长此以往，后来触于突发的事机，或是激于义气，想出来协力改造社会，也就无从改造了。因为不备于平时，一旦事临，实有不知所措的。所以我很希望诸君，第一要培养实力，而改造社会的念头不可一日飞去。而且能够利用我前面所说的三件——团结、毅力、牺牲。那末即使我们所处的社会不能改造于今日，总也不会使其爆碎，而自由和幸福不怕得不着了！直言恕罪，敬祝诸君的进步！

1924年4月6日

原载《台湾民报》2卷7号，1924年4月21日

注：马克思这句话见于《共产党宣言》，现在的译文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指 20 年代在台湾和日本开展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糟糕的台湾文学界

这几年台湾的文学界要算是热闹极了！差不多是有史以来的盛况。试看各地诗会之多，诗翁、诗伯也到处皆是，一般人对于文学也兴致勃勃。这实在是可羨可喜的现象。那末我们也应能从此看出许多的好作品，而且乘此时机，弄出几个天才来为我们的文学界争光，也是应该的。如此才不负这种盛况，方不负我们的期望，而暗淡的文学史也许能借此留下一点光明。然而创诗会的尽管创，做诗的尽管做，一般人之于文学尽管有兴味，而不但没有产出差强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无遗，甚至埋没了许多有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泼泼的青年，我们于是禁不住要出来叫嚷一声了。

自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Renaissance）起于欧洲以来，西洋的文学焕然一新，迥非昔日可比。自古典主义而浪漫主义，自浪漫主义而自然主义，到现在，自然主义的时运也已去了，所谓新理想主义、新现实主义，已布满了全世界的文坛了。就是文化落后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跟政治运动之踵，文学革新运动也崛起了。明治、大正的文坛上，出了不少的战士，站在睡眼朦胧的文坛上雄呼疾叫不遗余力，现在他们的成绩显著，差不多已不让欧美独擅其长了。而且社会上、政治上乱麻似的中国也已经过了一番新生命的洗礼了，所以现在中国的新

文学，也大有可观了。总之，现在的时代，无论什么都以世界为目标，如政治、如外交、如经济等等都是世界的，文学也不能除外，所以现代的文学，已渐趋于一致，而世界的文学的成立，也就在眼前了。然而，还在打鼾酣睡的台湾的文学，却要永被弃于世界的文坛之外了。台湾的一班文士都恋着堇中的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

像台湾那般小小的岛，而且幼稚的文学界，不知自行革新也罢了。但这几十年来，日本文学界猛战的炮声，和这七、八年来中国文学界的战士的呼吼，都不能打动这挟在其间的小岛，欲说其是已麻木也太可怜了！我们台湾的人，识两国文字（日本和中国）的那么多，况且此两国都是最近的师表，正可借此来把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而事实却不如此，一般斯文气满面的文士，只顾贪他们的旧梦，不思奋起也来革新一下，致使我文学界还是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些活气，与现代的世界的文坛如隔在另一个世界似的，这是多么可痛的事啊！

我们不是好高务远趋新弃旧之徒，人喜欢我也喜欢，人厌弃我也厌弃。但事实上像古典主义（如台湾现在的文学）之当废，已成为一个绝对的真理了，不容余喙的真理了，如地球是圆的，人是要死的一样的真理了。

他们不但不能脱却旧文学的迷梦，踏入新文学的路上，而懂得文学是什么的人，恐怕也百中不能求一，（照这样结论起来，他们死守古典主义也难怪的。老实说一句，他们或许不自知其是守在古典主义罢。）试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做诗？诗是什么？（我所以拿诗来做例者，是现在历来也许都是如此

——台湾的文学，除诗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种的文学了。如小说、戏曲等不曾看见，所以现在台湾差不多诗就是文学，文学就是诗了，所以拿诗来做例，以下都是如此。）那么是问问着哑巴一样的了。（也许有不少很有研究的人，但这是拿大多数来说的。）所以他们不是拿文学来做游戏，便是做器具用。如一班大有遗老之概的老诗人，惯在那里闹脾气，诌几句有形无骨的诗玩，及至总督阁下*对他们称送秋波，便愈发高兴起来了。

还有一班最可恨的，把这神圣的艺术，降格降至于实用品之下，或拿来做法名钓誉，或拿来做迎合势利之器具，而且自以为儒文典雅。其实这种器具得来的名利，与用金钱得来的有何分别？实在比用金钱做器具的老实人更可鄙可恨的！

至于最可怜的是一班活泼泼的青年，被这种恶习所迷，遂染成一种偷懒好名的恶习。他们以为做诗易于得名（其实这算什么名），又不费气力（其实诗是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的），时又有总督大人的赐茶、请做诗，时又有诗社来请吃酒做诗。既能印名于报上，又时或有赏赠之品，于是不顾死活，只管闹做诗（其实是胡闹）。他们腹内半部唐诗合解也没有，只管搜尽枯肠，一味的吐，几乎把肠肚都吐出来。用尽心血，耗尽宝贵的光阴，其结果博得一个不知是好名还是臭名。几年之间，弄不出一句半句的好文字，却满腹牢骚，满口书臭，出言不是“王粲蹉跎”便是“书剑飘零”，到底成何体统？文学的殿堂，一定是不容这班人踏入的啊！

够了，够了，写了一大篇干燥无味的文字，写得头也痛了，手也僵了，眼也花了！总之，现在台湾的文学，如站在泥窟里的人，愈挣扎愈沉下去，终于要溺死于臭泥里了啊！

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快来协力救他，将他从臭泥窟救出来罢！新文学的殿堂，已预备着等我们去住啊！

最后还有二事要来敬告对文学有兴趣的人：

1. 多读关于文学原理和文学史的书；
2. 多读中外的好的文学作品（诗、剧曲、小说等）。

前者可以明白文学是什么，方不走入与文学不相关之途。知道文学的趋势，方不死守僵尸而不知改革。

后者可以养成丰富的思想，而磨练表现的手段。

表现在文学中虽不能算是最重要的，但你虽有很热烈的情感，很富裕的思想，要表现出来，倘若不会表现，或表现不老练，亦不能造就伟大的作品。

原载《台湾民报》·2卷24号，1924年11月21日

注：* “总督阁下”及下文的“总督大人”，指当时日本派驻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本文所指是第十任总督伊泽多喜男，亦即本集《随感录》中之“伊泽总督”。

欢送辜博士

喧嚣颇久的辜鸿铭博士*，已踏入台湾之地了。各界欢迎的热烈，真是近来不常见的！特殊阶级的欢迎不消说，就是官界也十分地表示欢迎之意，台湾的三新闻也齐声欢迎其来台。啊！欢迎的人算不少了。不，宁可说太多了，太热狂了。我生怕那老受不惯这样的热狂的欢迎，以致惹出病来，设或不幸，又因病而不得不把一堆老骨骸埋在此异地他乡，那就太可怜了！因此，我反而欲把一服“清凉解瘟散”来致敬于大贤之前，这大概也是这位老博士所喜欢容纳的罢。

辜君的学识如何，我们因为没有看过他的名著，所以不便遽加批评。但是他的思想的腐败陈朽，在中国老早就有定评了，所以也不用我来批评。然而他这次的渡日、渡台，说是带了一种新的使命，是欲在日本、台湾提倡东洋文明，鼓吹东洋精神。提倡东洋文明，鼓吹东洋精神，反过来说，便是要排斥西洋的精神、西洋的文明。而这层是我们所以不满意他的。

我们虽然不可无条件容纳西洋的精神或文明，但也不当固守着东洋的精神或文明来顽拒它。须知世间事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东洋文明有东洋文明的好处，而西洋文明也自有它的好处。我们处今日之时世，当取长补短，不该拘执一方，以致得此失彼，误己误人，误了社会。况从今日的社会看

去，东洋文明的缺点比比皆是，而其不合现代人的生活，也是众人所公认而且痛感着的。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者，一跃而为三大强国之一，与其说是东洋文明之力，倒不如说是东西文明之合力。与其说是东西文明之合力，倒不如说是西洋文明之力。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独断，乃世人所公认的。凡是有良心的日本人，哪一个敢不承认伯尔利卿是日本国的恩人。假使当时明治大帝国守着从来的锁国主义，而没有传入西洋的文明到日本来，那么，现在的日本，怕也和现在的中国相去不远了。这不但政治上如此，学术上、实业上也都是如此。

然而，偏有一班没廉耻的东洋学者，硬要张冠李戴，把这段功劳欲尽归于东洋文明的身上去，我们这位老博士就是此中的一人。不然，怎的他一踏入日本之土，便连声的说东洋文明之粹汇集在日本，而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话至少可以来证明他的意思是说：日本有今日之强盛，是因为存着东洋文明所致的，而中国所以有今日之弱，是因为没有存着东洋文明。虽然我们也承认日本还保存着东洋文明的一部（就是中国也保存着一部），但日本之所以能致今日之盛强，决非东洋文明之力，这是如前面所说的。可是一班愚顽的东洋文明信者，却喜得什么似的，不能回顾事实如何，便大欢迎而特欢迎他，而许多顽劣的言论机关，还替他大吹牛皮，这正如梁启超，一听见西洋人研究东洋文化，便喜得眉舞眼笑似的。

够了，受够了，我们台湾已用不着你来鼓吹东洋文明，提倡东洋精神了。我们台湾的东洋精神，东洋文明，是嫌其太多不嫌其太少啊！辜老先生，你还不觉悟东洋文明或精神之不合现代人的生活么？你还不承认东洋文明或精神误了中国么？要记得！输入西洋文明太迟的中国，是被东洋文明弄坏了的，而

且连你本身也被它弄得无可容身之地，如此你还想不够吗？你还想带它来弄坏日本，弄坏台湾吗？

辜鸿铭博士，咱们说句诚实话罢：我愿请一阵东南风，送你一帆风顺，归到中国去！

然若辜君此行，没有带什么使命，但欲逛逛而已，那么我就不欲多嘴了。

1924年11月23日

原载《台湾民报》2卷26号，1924年12月11日

注：* 辜鸿铭（1856—1928）字汤生，福建同安人，曾留学英、法、德等国，后任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多年。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主张复古，反对革新。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著文讽刺他赞扬旧中国妇女缠足。

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

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有人对我说，台湾有一位大诗人，办个诗杂志。当时我对于诗学非常地有趣味，所以我甚以不能一睹为憾！因为我预料这位大诗人一定有什么对于诗和一般的文学的妙论来使我开开眼界，而驽钝的我，或许能因此得到很有效的教训，所以我愈期望要读它一读。

我终于达了我的期待了。我昨日在友人处，怀抱着满腔的热望，把他送给我的那个杂志读了好几遍，但我终于失望了。我不但没有照我的预料，得到什么好的教训，甚至把我的肠肚都气破了。可是后又觉得好笑！我笑了一夜还没有止，直到现在还一面笑着一面写这篇原稿。我想把他的妙论抄在下面来与诸位一同笑。

……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噤噤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秕糠古籍，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特西人小说戏剧之余焉。其一滴沾沾自喜是诚埳井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跋。

我们读了这篇妙论之后，立刻可以知道这位大诗人是反对新文学而又不知道新文学是什么的人。然而我最不满意的，是他把“汉文可废”和“提倡新文学”混作一起。不但如此，若照他的意思是“提倡新文学”之罪甚于“汉文可废”。一笑！

请问我们这位大诗人，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断定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的人，便都说汉文可废，便都没有读过六艺之书和百家之论、离骚乐府之音。而你反对新文学的人，都读得满腹文章吗？啊！你的自负也太过。我现在把他所分的新和旧分划在下面：

新 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主张汉文可废。丐西人小说戏剧之一滴，沾沾自喜，鼓吹新体诗。

旧 口已读六艺之书，目已接百家之论，耳已聆离骚乐府之音，主张保存汉文。鄙弃西人小说戏剧，鼓吹旧体诗。

这样给他分析起来，便可以了然明白他对于新文学是门外汉，而他的言论是独断，是狂妄，明眼人一定不会被他所欺。啊！我想不到博学如此公，还会说出这样没道理，没常识的话，真是叫我欲替他辩解也无可辩解了。我能不为我们的文学界一哭吗？

我在这篇批评的文字里，不愿意插入论新文学的本质的文字，但于最近之间，或许会另写一、二篇关于此事的文字。我最希望反对新文学的人，先读一读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文字。——这个问题在中国已是十年前的旧事，现在已从讨论进到实行期了。

新旧文学的争论，在七、八年前最激烈。一班冬烘先生，被一班新文学家打得片甲不留。这实是义旗到处，三军闻风而逃，哪一个还敢明目张胆？

我最痛恨的是坐井观天之徒，夜郎自大之辈。他们只知己而不知彼，一味夸博，甚至捏造事实，瞎说瞎闹，甚望我台湾

的文人不可如此！

1924 年 11 月 20 日

原载《台湾民报》 2 卷 26 号，1924 年 12 月 11 日

请合力拆下 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

—

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湾“自归并日本”以来，因中国书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

回顾十年前，中国文学界起了一番大革命。新旧的论战虽激烈一时，然而垂死的旧文学，到底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一班顽固的老学究败得垂头丧气。那一大座的破旧殿堂——旧文学的殿堂，经了这阵暴风雨后，已破碎无遗了。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地在那里重建合乎现代人住的殿堂了——新文学的殿堂。可是我们最以为憾的是，这阵暴风雨却打不到海外孤悬的小岛。于是中国旧文学的孽种，暗暗于败草丛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旧的——以苟延其残喘，这就是台湾的旧文学。

二

我们回顾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禁不住手痒了。我们

因为痛感这座破旧的殿堂已不合现代的台湾人住了。倘我亲爱的兄弟姊妹还不知醒过来，还要在那里贪梦，就有被其所压的危险了！我不忍望视他们的灾难，所以不自顾力微学浅，欲率先叫醒其那里头的人们，并请他们和我合力拆下这所破旧的殿堂。——台湾并不是没有受了中国文学革命或其他的影响而已觉醒的人，但大多数的人，对于文学革命的意义还没有了明白。一方面又有许多无耻之徒，欲逆天背理，呆头呆脑的竖着旧文学的妖旗，在文坛上大张其声势，所以我愈觉得此事之不可或缓。

可是无学浅才如我而欲言文学革命事业，实在自衷心感着不安！只是我不敢以文学革命军的大将自居，不过是做一个导路小卒，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并且替它呐喊助攻罢了。所以觉得责任轻松些！

三

我在前面已提过，我是欲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意义，所以后面所说的话，大半是引用他人之语，而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怕有一部分的人要嫌弃我的话太旧，但这是没有法子的。

我们今日欲说文学革命，非从胡适的“八不主义”说起不可。所谓“八不主义”是什么？

- (一) 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
- (二) 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学；
- (三) 不用典；
- (四) 不用套语烂调；
- (五) 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 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学；

(七) 不摹仿古人；

(八) 不避俗话俗字。

我在下面要略略逐条把这八条说明：

(一) 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

欲知此条，非先明所谓“物”是什么不可。这里所谓物，乃指思想与情感二者，并不是古人之所谓“文以载道”之“道”。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思想是文学的血液，文学而没有情感、没有思想，则如人之没有性命，没有血液。没有生命、没有血液的人，从根本上已失掉其做人的资格了。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文学，也从根本上失掉其为文学的资格。所以说“言之无物”的文学，是必然的事。

中国近世的文人（当然台湾的文人也在内），只一味的在声调字句之间弄手段，既无真挚的情感，又无高远的思想，其不能造出伟大的作品也是当然的。况台湾今日的文学，只能求押韵罢了，哪里顾得到情感和思想。这种文学当痛绝之。

(二) 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学。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 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胡适）

常常有一种人，他明明是在得意的境遇，而他自己也很满意着，但一为诗文，便满纸“蹉跎”、“飘零”、“落魄”……等